

突厥语历史音变的五条基本规律

李树辉

[提要] $\kappa > b/v/w/j > \emptyset$ 、 $m/b/p > v/w/f > \emptyset$ 、 $g > v/w/j > \emptyset$ 、 $q/\kappa > \chi > \emptyset$ 、 $a\kappa a/a\chi a > a > a$ 是突厥语历史音变的五条基本规律。古代不同部落和不同地域的语言中所具有的不平衡性表现为诸多现代语言的不同特点。

历史音变在不同部落和不同地域的语言中的不平衡性，是导致“d音化”的前古突厥语（3—6世纪）发展为分化型方言（j方言、 ϕ 方言、 δ 方言、z方言、混杂方言）和混合型方言（n方言、h方言）等古突厥语（7—12世纪），并进而发展为诸多现代语言的重要原因。^① 探讨这些语音的演变、发展轨迹，有助于深化对突厥语族语言的分化过程以及现代诸语言语音特点形成原因的认识。本文拟就突厥语中若干最基本的历史音变问题进行探讨。

一 κ 音向b/v/w/j诸音的演化和脱落

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材料相比较可发现：在8世纪的文献中处于词尾或两元音之间的b在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均演变为v/w，而在维吾尔语中则均为j音。例如：

8世纪文献	《词典》 ^②	维吾尔语	汉 义
eb	I .43/110 <i>ev/ew/øv</i>	<i>øj</i>	房屋
	I .506 <i>sevyg</i>	<i>søjymlyk</i>	亲爱的
seb-	II .20 <i>sev-</i>	<i>søj-</i>	吻
	II .137 <i>seviŋ-</i>	<i>søjyŋ-</i>	接吻；相爱
sebin-	II .216 <i>sevin-</i>	<i>søjyn-</i>	爱
	II .264 <i>sevtyr-</i>	<i>søjdyr-</i>	让亲吻
sub	III .178 <i>suv</i>	<i>su</i>	水
	III .510 <i>seviŋŋ</i>	<i>søjyŋŋ/søjyŋŋe</i>	喜事；欢乐；喜钱，赏钱

值得注意的是，《词典》中的suv“水”，在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以下简称《传说》）中写作suk或usuk；而在现代语言中亦有多种语音形式。例如：su（维吾尔语、

^① 李树辉：《古代突厥语方言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2003年第1、2、4期，2004年第1期。

^② 本文所引《突厥语大词典》1—3卷的材料均源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1983、1984年维吾尔文版，分别简称为“I”、“II”、“III”，后面的数字为所在页码。

土耳其语、鞑靼语、卡拉卡帕克语、西部裕固语); Xiu (巴什基尔语); su/sux (阿尔泰语); suv/su (撒拉语); suk (哈卡斯语); suw/sux (土瓦语); suw (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库慕克语); su (柯尔克孜语); u (萨哈语)。

《词典》中的suv“水”，在附加第三人称领属词尾时使用的形式为-i。如：I.131: ertiŋ suvi (额尔齐斯河); III.47: jabaqu suvi“雅巴库河”。在维吾尔语等语言中虽写作su，但附加领属人称词尾时，却要补加上一个j音。如：su+j+imiz>suŋimiz“我们的水”。也即是说，诸突厥语言中的su、sux系由sub/suv/suw演变而来；而sub/suv/suw则当由suk演变而来。如若再参考萨哈语的u，该词的蒙古语词形usu以及《传说》中的usus，可进而推断其最为古老的形式当为*usus。以上结论，还可通过其他词语形式予以证实。

《词典》在解释 eŋgek“驴”一词时称该词还可说成 eŋjek (I.150)，同时收录了 eŋjek 词条 (I.154)；在解释 ovruk“锁骨；山脉断裂复合处，脊椎连接处”一词时称该词的正确写法为 ovrux (I.159)，同时亦收录了 ovrux 词条 (I.133)。另如：I.613: tamraq“喉咙”，维吾尔语作 tamaq；I.614: ŋomruq“红脚鸦”，维吾尔语作 ŋomuq；I.87: ulux“大”，维吾尔语仍为 ulux，库慕克语为 ulu，阿尔泰语有 ulu 和 ulux 两种形式，鞑靼 (塔塔尔) 语作 olo，诺盖语作 ulli，哈萨克语作 uli；I.502: tirig“活的”，维吾尔语作 tirik，阿尔泰语有 tiry 和 tirik 两种形式；I.507: kitŋik“小”，维吾尔语仍作 kitŋik，库慕克语作 kitŋi，撒拉语作 kitŋi；I.43/110: ev/ew/ov“房屋”，维吾尔语作 oŋ，土瓦语作 oŋ 和 owh；III.209: tak“山”，维吾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和哈卡斯语中仍作 tak，土瓦语作 dak，土耳其语作 da/dak，乌孜别克语作 tor，哈萨克语、诺盖语和塔塔尔语作 tau，柯尔克孜语作 tor/tau；III.208: bak“带子”，维吾尔语仍作 bak，撒拉语作 rak，哈萨克语作 bau，柯尔克孜语作 bor。与此相应，维吾尔语的 belwax“<bel bak, 腰带”，哈萨克语作 belbew；I.77: ovuz“初乳”，维吾尔语仍作 ovuz，哈萨克语作 uwez；I.74: axir“重，严重，重大”，维吾尔语作 axir，哈萨克语作 awer；I.77: axiz“嘴”，维吾尔语作 axiz，哈萨克语作 awez；I.133: axriq“疼，痛，病”，维吾尔语作 axriq，哈萨克语作 awrew；I.533: qaxun“甜瓜”，维吾尔语作 qoxun，哈萨克语作 qawen；I.86: adix“熊”，土瓦语作 adix，维吾尔语作 ejiq，哈卡斯语作 azix，哈萨克语作 aju，土耳其语作 aji；I.101: oxul“儿子”，在诸多突厥语言中都为 oxul，哈萨克语和诺盖语作 ul，而楚瓦什语则为 ewal/iwal。

至今，在维吾尔语木尔吐克土语中，仍存在着许多 w/v 的交替现象，即标准语中两元音之间的 w 音，在木尔吐克土语中发成 v 音。^①例如：tuwaq>turaq“锅盖”；tuwaqla>turaqla“堵”。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上古突厥语时期处于音节末尾、词尾或两元音之间的 v/w 音，在前古突厥语时期读为 v 音，约自中古突厥语 (13—15 世纪) 时期开始又演变为 j 音，或进而脱落。

二 m/b/p 音向 v/w/f 诸音的演化和脱落

m/b/p 诸音的发音部位相同，仅发音方法有别，故而具有互相转化的条件。据《词典》记载，b 音和 m 音的对应关系，也正是乌古斯人、克普恰克人、苏婆人的方言和突厥人的方言的重要区别性特征。即后一方言多将前一方言中位于词首的 b 音改为 m 音。例如：ben~men“我，

^① 木哈白提·哈斯木：《木尔吐克方言》，《语言与翻译》1991年第2期。本文所引木尔吐克土语的材料均源于此文。

I .514); byn~myn “肉汤” (I .514); bykym~mykim/mykin “女式” (I .514); be~me “咩咩” (III.286)。上古突厥语时期存在于不同方言中的这种b/m对应关系,亦为现代语言所继承。例如:土耳其语中的ben“我”,在诸多现代突厥语言中作men/men;维吾尔语的bojun“脖子”,哈萨克语作mojun,西部裕固语作moen/moin;维吾尔语的bilen (<birle)“和,用”,在哈萨克语中作menen/benen。

从发音部位“舌位”来看, m/b/p诸音亦与v/w/f音相同,因而也同样具有转化的条件。III.43 便收录了表示“裙子”意思的juvqa、jupqa等两种形式,且称jupqa还可拼读成jufqa。III.48 称:“japʃan——蒿。此词另有javʃan的拼读形式。这与上述有关p换作f的规则相同。”III.33 称乌古斯部族 24 部落之一的java部落亦可拼读成jawa或jafa。III.11 收录了jafuz“凶恶的,坏的”一词,III.157 和III.468 又收录了javuzlandi“被认为是凶恶的,被认为是坏的”、javuzladi“认为是凶恶的,认为是坏的”等两个派生词。I .137 对 epmek词条的解释为“epmek——馐。样磨、突骑施人及某些乌古斯、克普恰克人的词汇。阿拉伯语中也有这种语音交替现象。由于发音部位相近而将p换为v,将v换为t。……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突厥语。”

其实,《词典》中便有此类例证,如 I .138 就收有 etmek“馐”一词。据语音演变规律来看,t音亦即 etmek当是其最为古老的形式,而p音亦即 epmek则当是后起的语音形式。

m/b/p诸音与v/w音的转换现象,在维吾尔语木尔吐克土语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

转换类型	维吾尔标准语	木尔吐克土语	汉 义
b>m	obdan	amdan	好, 善
w>m	nawat	namat	冰糖
p>w	ʃapaq	ʃawaq	眼屎
	kepek	kewek	麸皮
	sopun	sowun (sogun)	肥皂

p向v/w音的转化现象,即使在维吾尔标准语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时音变现象,如: keji p almaq>keji walmaq“穿上了”; jep almaq>jewalmaq“吃了”。前引 epmek“馐”的历史演变,尤能说明这一问题,即: epmek>evmek>emek,进而在“h音化”规律的作用下演变为hemek (=hemek)。hemek一词,至今仍在维吾尔语喀什噶尔话中使用。可见, m/b/p诸音向v/w音的演变并进而脱落,亦是突厥语语音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

三 g音向v/w/j诸音的演化和脱落

与b音向b/v/wj诸音演化的规律相似,突厥语中的g音也具有向v/w/j音演化并进而脱落的规律。I .43/110: ev/ ew/øv“房屋”,维吾尔标准语作øj,土瓦语中有øg和øwh两种形式; I .566: ʃigne“碗,器皿”,维吾尔语作 ʃine;维吾尔标准语中的kyje“煤烟子”,在维吾尔语木尔吐克土语中却作køge。“驴”在《词典》中有 eʃgek和 eʃjek两种形式,分别释为:“eʃgek——驴。两种语言之一称作 eʃjek。其中的j字母代替了重叠的两字母中的一个。”(I .150)“eʃjek——驴。也说成 eʃgek。用j音拼说此词较雅致。”(I .154)以上记载表明,11世纪时该词中的g音还正处于向j音演化的进程中。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该词在维吾尔语中已演变为eʃek,在柯尔克孜语中为eʃek,在西部裕固语中作eʃek。g音显然是先演变为j音,之后又进而脱落,即:

ɛfɣɛk>ɛfjɛk>ɛfɛk/ɛfɛk/ɛʃɛk。

除了g音具有向j音演化并进而脱落的规律之外，甚至于连gi音组都有整体脱落的现象。

《词典》称：“jigi——jigi jikɑtʃ“枝条交错生长的树”。有时因g音脱落也说成ji jikɑtʃ的形式。jigi tiʃ“无间隙的紧密的牙齿”。ton jigi tik“将棉衣的针脚缝密”。针脚被说成ji。此词的原形为jigi。”(III.30—31) jigi中gi音组脱落的历史进程，显然是jigi>jiji>jii>ji。

在维吾尔语木尔吐克土语、库车土语、塔里木土语、阿图什土语以及罗布泊方言中，至今仍存在着g~w交替的现象。如标准语中的w音，在木尔吐克土语中多发成g音或脱落：wapa>gupa“信义”；wapadar>gupadar“忠实的”；ɟuwan>ɟugan“少妇”；hawantʃa>hagantʃa“研钵”。标准语中第二音节以w音开头，以r音结尾的词，在木尔吐克土语中w音脱落（r音发成ɾ音）。例如：qowurɣa>qorɣa“肋骨”；kelwir>keluɾ“筛子”；ɟanwar>ɟauuɾ“动物”；jalwur>jaluɾ“恳求”。据调查者报告，在老年人的发音中，w音的g音化现象十分普遍；而青年人有时发w音，有时仍发g音。表明g音正处于向w音转化的进程之中。另如库车的老年人将miwilik“有果实的”说成møgylyk，阿图什土语中亦将ɟuwa“皮袄”说成ɟuga，将zuwula“剂子，福分”说成zugula。^①此外，在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中，也同样存在着g音向j音演变的现象。如维吾尔语的ige“主人，所有者”，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均作ije。由此亦可看出g音向v/w音演变、发展的轨迹。

四 q/ɣ音向x音的演化和脱落

q/ɣ向x的演化并进而脱落亦是突厥语历史音变的规律之一。

q/ɣ音的“x音化”现象约出现于7世纪初。立于蒙古国哈尔乌苏的《多罗郭德回鹘文碑》，为木杆特勤(buqan teqin)的纪功碑。木杆之父土门(tymen)于魏废帝元年(552年)正月自号伊利可汗(ɛl qakan)，约于当年便去世，可汗由木杆继任。^②由碑文中自称“木杆特勤”度之，该碑当立于552年。另在新疆昭苏县种羊场小洪纳海石人粟特文题铭中，亦有“muXan可汗之孙，像神一样的……nri可汗”，“持有王国二十一年”的内容。“muXan可汗”也便是“木杆可汗”，“nri可汗”亦即泥利可汗。泥利为木杆之孙、鞅素特勤之子，587年继任可汗，卒于600年或601年。碑文中保留了“q音化”形式，而在石人题铭中已出现“x音化”现象。前突厥汗国为乌古斯部族所建。据《词典》记载，将q音发成x音的现象正是乌古斯语和克普恰克语的特点：“qaju——哪个，哪一个。此词也可以说成Xaju。q音换成了x。乌古斯人和克普恰克人将q变为x。他们是Xalatʃ人的一个阶层。突厥人说qizim‘我的女儿’，他们则说成Xizim。突厥人将‘你在哪儿’说成qanda erdiq，他们则说成Xanda erdiq。”(III.301)

《词典》中同时亦收录了若干“x音化”词汇，如I.567: barXan“巴尔罕”；III.41: jaXʃi“好”；III.215: Xaqan“可汗”；III.215: Xan“汗”；III.567: Xalatʃ“哈拉奇”。另有一些词在《词典》中为“q音化”形式，而在维吾尔语中却为“x音化”形式。例如：I.298: uqtur->uXtur“通知”；I.533: qatun“可敦，夫人”>Xotun“老婆”；I.566: qofni>Xofna“邻居”；III.569: barskan>barXan“巴尔斯罕”。某些词中的q音演变成x音后进一步脱落。《词典》关于qulaq

^① 米尔哈雅提·米尔苏丹著，吾买尔·尼亚孜译：《阿图什方言的某些语音特征》，《语言与翻译》1993年第1期。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965页。

一词的解释，恰好为这一演变过程提供了佐证：“qulaq——耳朵。有人说qulXaq。也有人说qulqaq。最前面的说法是正确的（I.498）。”

q/ɤ音演变为X音的现象，亦常见于古代碑铭文献和写本文献。如teŋriqan“天可汗”、qan“汗”、barsɤan“巴尔斯罕”、burqan“佛”、tarqan“达干”、qatun“可敦，夫人”、qotɤu“高昌”等词在吐鲁番出土的TIII号和I B4672号回鹘文木柁文书中便写作teŋriXan、Xan、barsXan、burXan、t(a)rXan、Xatun、Xotɤu。

五 aɤa/aXa音组向a音的演化

aɤa/aXa音组向长音a: 演化并向短音a的演化是突厥语族语言的一条重要历史音变规律。众所周知，“可汗”为突厥语qakan (<Xaqan<Xam<Xan) 的音译。qakan为该词最为古老的语音形式，曾见于突厥语碑铭文献及《传说》；《魏书·蠕蠕传》所载柔然首领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则为该词最早的汉译形式。^①社仑称可汗的时间，在394—402年之间。此后，又为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蒙古所沿用。吐蕃亦曾借用过该词。关于qakan<Xaqan<Xam<Xan的历史演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仁智之论，而该词的演变又恰与突厥语aɤa/aXa>a>a音变规律密切相关。

aɤa/aXa>a>a和q/ɤ>X音变现象，至晚到8世纪末便已出现。由此也就出现了qakan的各种变体——Xan、Xam和Xaqan。此后的《契丹国志》称君主曰“呵”，《女真译语》称金帝曰“罕安”，《元朝秘史》称元帝曰“合罕”，当均为Xan、Xam或Xaqan的音译。《词典》对Xan和Xaqan的解释为：“Xan——汗。突厥人最大的帕迪夏（padifa，国王）。阿夫拉西雅甫的儿子们也称为汗。阿夫拉西雅甫本人则称为可汗（Xaqan）。关于这一称号的来历，有一个很长的故事。”（I.215）

今天虽已无从知晓这一称号的来历，不过，上文倒是为qakan>Xaqan>Xan的演变进程，亦即aɤa/aXa>a>a和q/ɤ>X音变现象的存在提供了佐证。据此可知，Xaqan和Xan的语义并无区别，仅是发音不同而已。Schott、拉德洛夫、白鸟库吉、刘义棠等学者亦持此说，^②但韩儒林教授则认为：“突厥‘可汗’有大小之别。最高元首曰‘可汗’（qaghan），又称‘大可汗’。‘可汗’可分封其子弟为若干‘小可汗’。突厥文《噶欲谷碑》第一碑西面第二行第三行之‘汗’（qan），当即吾国史籍中之‘小可汗’也。”^③即认为qakan为“大可汗”，qan为“小可汗”。其实，qakan与qan（Xan）在称名指谓上并无区别，“大可汗”、“小可汗”仅是其地位高低、权力大小的不同而已。正为此，杜佑《通典·突厥上》才有“亦有可汗位在叶护下，或有居家大姓相呼为‘遗可汗’（øj qakan）者，突厥呼‘屋’为‘遗’（øj），言‘屋可汗’也”^④之谓。从时间先后看，qakan要早于qan；qakan、qan要早于Xaqan、Xan。qakan正是在aɤa/aXa>a>a音变规律和q/ɤ>X音变规律的交互作用下演变为Xaqan、Xam和Xan的。可证明这一演变进程的是，在《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等碑铭中，

^① [唐]杜佑《通典·蠕蠕传》注称：“可汗之号始于此。”

^②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10—113页。

^③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④ 通常认为，8世纪前后突厥语尚无方言之别，故而将“遗”视为突厥语eb/ev的音译，实则有误。“j音化”形式为乌古斯语、克普恰克语以及回鹘语等方言所特有，该词显然为øj的对音。有关古代突厥语方言问题，请参阅拙作《古代突厥语方言研究》一文。

对突厥、回鹘的君主及唐朝的皇帝均作qaraqan而无qan; 在撰写于692年的默棘连可汗碑中既出现了qaraqan, 又出现了qan; 在叶尼塞碑铭中则仅见qan而无qaraqan。^①《传说》中的若干词语都保留了长元音形式。《词典》中亦保留有长元音现象, 但《传说》中的长音词在《词典》乃至维吾尔语中均已变为短音(短元音)。例如:

《传说》	《词典》	维吾尔语	汉 义
qaraqarluq	I .618: qarluq	qarluq	葛逻禄
qaraqatir	I .471: qatir	qetfir/Xetfir	骡子
taqam	III.214: tam	tam	墙
qaraqan	III.215: Xaqan	Xaqan	可汗
qaraqar	III.203: qar	qar	雪
yut-	II.460: jit-	yt-	丢失

《传说》作于763年之前,^②保留的长音词较多;《词典》作于11世纪,保留的长音词则较少;维吾尔语中则干脆全为短音。正符合突厥语长元音向短元音演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值得注意的是,Xan“汗”在土瓦语中至今仍保留着长元音形式——Xan,正好可为上文所论提供一个论据支持。由于q/ɣ>X音变规律以及aqa/aXa>a>a音变规律在不同部落方言中的表现并不是同步的,具有不平衡性,因而qaraqan一词在演变进程中也就自然呈现出不同的变体形式。其演变进程为:(一)qaraqan>Xaqan;(二)qaraqan>qam>qan>Xan。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突厥语长元音现象的认识,始终存在着分歧。约略有“第一性长元音(原始长元音)说”和“第二性长音(派生长元音)说”等两种观点。鉴于突厥语语音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都存在着ɣ>b/v/w/j>脱落、m/b/p>w>脱落、g>v/w/j>脱落、q/ɣ>X>脱落、aqa/aXa>a>a和-r音的脱落等五条基本规律,这五条基本规律在古代突厥语诸方言和诸现代语言中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笔者赞成“第二性长音说”的观点。

综上所述,突厥语语音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都存在着ɣ>b/v/w/j>脱落、m/b/p>w>脱落、g>v/w/j>脱落、q/ɣ>X>脱落、aqa/aXa>a>a这五条基本规律。它们在古代突厥语诸部落方言和地域方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平衡性,是导致古代突厥语分化、发展为诸多现代语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Abstract

In this paper, five sound change laws in ancient Turkic languages are introduced. They are $\gamma > b/v/w/j > \emptyset$, $m/b/p > v/w/f > \emptyset$, $g > v/w/j > \emptyset$, $q/\gamma > X > \emptyset$, $aqa/aXa > a > a$. The author holds that different features in ancient Turkic languages have remained as those of modern languages.

(通讯地址: 830011 新疆 乌鲁木齐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第110页。

^② 详见拙作《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有关问题考辨》,《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